

清末民初作家迁徙与上海文学场域的生成

王 力

〔摘 要〕 清末民初江浙作家向上海的迁徙,不仅为这个新兴的城市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作家群落,为现代作家在城市中的交往与生存提供了新鲜经验,在传播科学知识和生产文学理论知识方面也有开先河之功,并且为现代文学媒介生态繁荣贡献了很多经验。迁沪作家在人事聚合、知识传播、理论生产、媒介繁荣等方面的积极作为,使上海成为现代文学场域的空间起点。

〔关键词〕 迁徙;上海文学场域;生成

人们往往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合称,隐然以北京为空间原点建构现代文学历史,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要充分彰显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相当程度上还包含了对通俗文学的有意淡化或遮蔽),又体现出对于当下政治文化格局以北京为中心这一事实的尊重。然而,就历史进程的客观事实来说,上海才是现代中国文学的空间起点。清末到民初,迁居上海的文化人逐渐超越古典雅集式的群落聚合,坦然地以文学写作为基本经济来源;城市也不再是王权召唤的人才集纳之地,而是以渐趋发达的工商业条件、华洋杂处的混合文化语境、丰富多彩的现代传播媒介为基础的空间建构,上海文学场域就生成于这种空间背景。

从晚清至民国初期的文学创作与传播来看,上海之外的中国空间范围内仍然主要传播和阅读着传统诗文,鼓吹“革命”的时评政论或者对域外文学作品的译介,传播源基本都在上海。从学界所认定的现代文学标准,即无论是小说居于中心的文体格局,还是现代白话为载体的表现形态,抑或强调独立人生精神与现实批评的审美诉求、崇尚理性思辨和现代民主科学观念的政治启蒙诉求来看,上海都是最初的现代文学场域。从二十世纪初众多小说杂志创办推动上海媒介生态渐趋繁荣,从文体结构到审美观念牵动中国文学的整体变革,继而各种文学思潮碰撞争鸣于此,铸就上海越来越异彩纷呈的文化特色。一个常常被忽略的事实是,这些造就了上海初期文学生态的作家绝大部分不是本地人。那么不能不探究的问题便是:这些作者从哪里来?他们为何普遍而且长期地选择上海为迁居地?其迁居对上海现代文学场域的生成、发展与嬗变产生了哪些影响?

王力,文学博士,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徐州 221116)。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作家迁徙对现代文学生态的影响研究”(13BZW138)研究成果。

一、江浙作家迁沪聚合呼应

1920年《小说新报》第十二期登出《停刊启事》：“新文学潮流今方极盛一时，风会所趋，势使之然。近来来函要求鼓吹新潮者甚多，本报宁使停办，决不附和取媚，以取削足适履之讥。”从这种表述可以看出在上海繁荣了二十年左右的晚清“新小说”已不再能代表当时的潮流；“新文学潮流”显然指的是鲁迅、冰心等人的作品风范，不仅影响渐广，而且正处于“极盛一时”的态势。任何历史潮流的退场，都应该以该潮流主导者的普遍自觉为基本标志，而不能以其反面对面的评价为准。这则启事不仅印证了掀起于北京的新文学潮流已经成为上海文坛的风向标，也从反面证明上海文坛一度“盛”过的事实。

造就了上海文坛曾经之“盛”的作家，绝大多数来自江苏、安徽、浙江，因此概括称之为江浙作家。且大体看一下清末民初迁沪作家的名单和他们的文学活动，就知道他们为上海文学场域带来了怎样新颖的内涵。张春帆原籍常州，迁居上海后，不仅创作了《九尾龟》、《宦海》等狎邪或黑幕小说，还常常为《十日小说》（1909年9月15日创刊）写稿。吴沃尧原籍广东南海，少年迁居上海，从1904年开始在《新小说》上发表《电术奇谈》《九命奇冤》《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成为谴责小说大家；李伯元原籍常州武进，1897年迁居上海，创办《指南报》，后改办《游戏报》、《繁华报》、《绣像小说》；刘鹗原籍镇江丹徒，一度留上海，《老残游记》最初就发表在《绣像小说》上；曾朴原籍苏州常熟，1898年春迁居沪上，后退出宦海，在上海创办了《小说林》杂志（刊载《孽海花》后五回）和真善美书店。正是他们齐聚沪上，才使上海与晚清谴责小说紧密联系在一起。徐念慈原籍苏州常熟，1903年迁沪，次年与曾朴等创办《小说林》；柳亚子原籍苏州吴江，1904年到上海，由入爱国学社而入同盟会而组织南社；包天笑原籍苏州，1906年正式定居上海，参与多种刊物编辑；徐天啸、徐枕亚兄弟与吴双热原籍苏州常熟，1912年迁居上海，《民权报》《黄花旬报》《小说丛报》都曾参与编辑和撰稿；李定夷原籍常州武进，曾经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1912年迁居沪任《民权报》编辑；严独鹤原籍浙江海宁乌镇，和茅盾同乡，1904年进上海读书，1908年开始在上海工作，1913年入中华书局，后主持《新闻报》副刊“快活林”达30余年；陈蝶仙原籍杭州，1912年迁沪，主持《申报·自由谈》期间，在王钝根主编的《礼拜六》上发表长篇小说《孽海疑云》；平襟亚原籍常熟，1916年迁沪，开始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杂文；李涵秋原籍扬州，其《广陵潮》（原名《过渡镜》）在上海《大共和报》、《神州日报》从1914年连载到1919年，1921年迁沪主编《小时报》，同时为《小说时报》、《快活林》等撰写小说。从苏州迁沪的作家还有顾明道、欧阳巨源、叶楚伦、徐卓呆、程小青、郑逸梅、姚民哀、范烟桥、江红蕉、程瞻庐等；原籍浙江各地的迁沪作家还有许廑父（萧山）、赵苕狂（吴兴）、冯梦云（慈溪）、严芙孙（桐乡）、许啸天（上虞）等。正是这批从江苏和浙江各地迁沪的作家，构成了鸳鸯蝴蝶派作家群，与谴责小说作家共同建构了从近代到现代的海上文学生态，和新文化运动后的北京作家群也有着多处交集。原籍江苏江阴的刘半农从上海习作鸳鸯蝴蝶派气息的作品起步；原籍安徽桐城的陈独秀曾经与苏曼殊一起为《国民日报》翻译《悲惨世界》（当时译名为《惨世界》），并于1915年9月创办了《青年杂志》。

按照学界现有的文学史划界方式，19世纪中叶到新文化运动之前称为近代文学。那么，之所以明确不再以“古代”指称，说明研究者都已认同了这段文学史内的各种创作与评论具备了明显的“非古代性”。如果普遍承认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文学进入了现代阶段，那么这段“近代文学史”毫无疑问是“现代文学”的发生阶段。谴责小说辞气浮露、直揭时弊，在审美旨趣上已经大不同于明清小说的婉讽喻世，翻译之风的流行更体现了明晰的世界意识，何况还有报刊杂志传播条件的逐步完善，在文化精神传播、审美观念熏陶、文学技法示范等方面确立了内涵丰富的“现代”标准。这些“现代”性因子，都是由迁居上海的作家引领风气，进而牵动北京及其他地区的文学生态变迁。

从一些报刊创办者、主持者的籍贯也可以看出这种“外来者”为众的特点。《新世界小说社报》月

刊(1906年创刊)的主编孙延庚(警僧)是江苏无锡盛泽人;《小说七日报》(1906年创刊)的创办者谈小莲是浙江海盐人;《新新小说》月刊(1904年创刊)主持者龚子英(号三楚侠民、侠等)是湖南安化人;《竞立社小说月报》(1907年11月创刊)的主编彭俞(号亚东破佛)是江苏常州溧阳人。相比之下,直到1925年左右以文学为业而且声名较著的上海本地作家不过是孙玉声、陈景韩、周桂笙、周瘦鹃、陆士谔、姚鹓雏、王钝根、朱瘦竹等10人左右。

迁沪作家主要来自苏州、无锡、常州、扬州、杭州等传统文学积淀深厚的地区,这种鲜明的原籍特点和上海开埠之后租界兴旺产生的吸引力有关,也和晚清太平天国运动对江浙地区社会的扰动有关。西方文化本是为殖民而来,被殖民的土地上最初产生的文化碰撞便不能不以弱势文化的妥协和自我裂变作为结果,上海周边这些区域首先承受了这种结果。当太平军从江西进逼南京时,引发了江浙地区人士向上海的大规模迁徙。“搬移者始自关外(指南京),旋及苏州,十去六七,渐及上洋(即上海)。”^①当苏州被太平军攻占,这种迁徙潮流更加明确地指向上海。“苏城失守,藩臬各官俱奔上海,制台亦逃上海出版业,预为浮海之计”。^②这里透露了一个有趣的信息,即晚清时候已经有些官员开始把迁沪从事“出版业”作为谋生之策。蒯光典创办金粟斋译书处就是一个例子。与当时各省纷纷开办官书局的情况不同,在上海开办的书局多为私人经营。太平天国将领发布的公告也透露了江浙人士纷纷迁沪的信息,“天京以及各处子女大半移徙苏郡,又由苏郡移居上海。”^③外国报纸则称“上海已成为安全的城市,这声名正广为传播。”^④这种社会观感与经验自然成为后来江浙地区人们迁徙时的基本参照。欧阳巨源笔记小说中就记载了这种社会心理:“混在杭州城里一万年也不会有什么机缘。上海是通商口岸,地大物博,况且又有租界,有什么事,可以受外人保护的。”^⑤上海的诱惑力可见一斑,其安全性无疑增强了诱惑力。《潘先生在难中》也可资佐证。鲁迅的记忆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上海过去的文艺,开始的是《申报》。……但这些事我不知道。我所能记得的,是三十年以前,……在那里作文章的,则多是从别处跑来的‘才子’。”^⑥鲁迅所说的“三十年以前”,正是20世纪开启的时候,他正是在绍兴创作了《怀旧》投往上海的,和当时上海刊物众多、小说盛行的风气密切相关。“才子”一词的讽刺意味且不论,“别处跑来的”的确道出了历史的真相。

正因为他们原籍相邻近,或者有某种亲缘关系,在迁徙之初就互相沟通,迁沪之后更是往还密切,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创作群落。绝大多数迁沪作家以出卖文稿或编辑报刊作为基本生活来源,相互评价推介的不再以传统诗文而以新创作的小说为主。李伯元以《游戏报》为纽带集聚了《苏报》馆老板陈范(祖籍湖南衡山,生于江苏常州)和主笔汪文溥(常州)、《字林沪报》高太痴(苏州)、《苏州公报》谢懒蝶、《新闻报》张康甫(浙江普陀)、《万国公报》沈毓桂(苏州)、欧阳巨源等编辑或作者,这些人对李伯元的小说多有好评。高太痴“不但为李伯元的小说写序文,甚至还代李伯元写小说”。^⑦徐枕亚、吴双热就是在徐天啸的召唤下迁居上海开始创作言情小说的;包天笑在招引同乡同道方面做得非常突出,江红蕉是包天笑的姻亲,因为有包天笑在上海卖文为生的成功例证,“慕天笑卖文之别有乐趣也,遂欣然致力于文字”。^⑧周瘦鹃、范烟桥、毕倚虹(原籍扬州)也都因包天笑的大力推介进入报界。这种作家之间的友谊不仅长期保持,还惠及更多的作家,张碧梧(扬州)就是因为得到毕倚虹的欣赏而

① 鹤湖意生:《癸丑见闻录》,《太平天国史料专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82页。

② 佚名:《萃湖笔记》,《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3页。

③ 《忠王李秀成给上海百姓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24页。

④ 《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99页。

⑤ 遽园(欧阳巨源):《负曝闲谈》,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80页。

⑥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90页。

⑦ 遽园:《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0年,第495页。

⑧ 朱孔芬:《郑逸梅笔下的艺坛逸事》,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第190页。

迁居上海开始小说创作生涯。^①这些作家之间的互相引荐,缘于卖稿为生的现实环境,又没有政治因素干扰,所以形成内部交往比较松散而外在审美特征却比较鲜明的文学群落。正因为没有政治因素干扰,即使遭遇某种集体性的批评而不至于影响其卖文生涯,这一群落的作家也并不作明显的反击,这样反而使得他们之间的友谊能够终生保持,其各自的文学创作轨迹演变也没有出现明显的跳跃或断裂,而是以渐变的方式融入现代文学的整体历史进程。

迁居必须有物质生活基础,迁沪作家的经济来源不是仕宦或其他产业经营,而是标准公开的稿费,这就为迁沪作家提供了以文索酬的依据和榜样,激发了他们的写作热情,也为更多年轻文化人迁居上海以写作立身作了示范,文学生态因此繁荣。^②1906年“已流行了计字数酬稿费的风气”,包天笑小说的稿费后来涨到“每千字三元”,^③《小说林》(1907年)创刊之初就登出了稿费标准:“本社募集各种著译,家庭、社会、教育、科学、理想、侦探、军事小说,篇幅不论长短,词句不论文言白话,格式不论章回、笔记、传奇。……甲等每千字五圆,乙等每千字三圆,丙等每千字二圆。”《月月小说》迅速呼应:“海内著作家如有以佳什见惠者,望投函本社审定刊登,或酬墨金,或谢书报。”^④商务印书馆1910年7月创办《小说月报》,卷首《征文通告》刊登的稿酬标准是:“中选者当分四等酬谢,甲等每千字酬银五元,乙等每千字酬银四元,丙等每千字酬银三元,丁等每千字酬银二元”。第五期《本社通告》调整为“中选者分为五等酬谢,甲等每千字五元,乙等每千字四元,丙等每千字二元,戊等每千字一元。”《小说时报》的稿费标准是:“第一等每千字两元半,第二等每千字一元半,第三等每千字一元。”当时苏州无锡一带塾师月薪不过十数元的待遇,相当于一篇万字左右的小说,这对于那些文化修养较高且有同乡在上海卖文的人来说,诱惑不可谓不大。朱鸳雏就是“为了谋食,旅居上海,操笔墨生涯。”^⑤平襟亚1916年到上海,凭借报章杂志获得的稿费,每月数十元,比原来在常熟做小学教员收入还高。^⑥以稿酬为生,自然要依赖读者市场,因此不主动传播震动世人的观念,而往往在情节营构和趣味性因子呈现方面下功夫,也是情理中事。这也正是后来他们被新文学阵营大加挞伐的根由。以消费为主要指向的文学生产,与以启蒙民智为诉求的文学创作,本来就不在同一个文化层面上,并不能因此否定鸳鸯蝴蝶派作家繁荣都市文化、满足大众文艺娱乐诉求的历史贡献。

他们对于刊物出版频率的应和、对稿费的期待,产生了至少两重结果,其一是他们的创作(或翻译)总量变多,往往因为刊物需求和稿费期待而兼顾多种文体的写作,多面手和高产从此成为现代作家与古代作家的重要区别。其二是比较密切地关注阅读市场,无形中加快了文体形式与内涵的更新节奏,这对于超越古典文学格局、建构现代文学的文体格局是非常有利的。当然,同时伴生的弊端是即时写作的类型化现象,精品少而芜杂之作众多。这种现象也反映出迁沪作家以精英身份追求“传之后世”的意识逐渐消淡,开始向满足大众文化消费的写作观念转型,从都市文化逐渐引领社会的角度看,也未尝不体现了一种“现代性”。

二、迁沪作家建构文学“新知识”

在1920年之前,迁沪作家通过翻译科幻、推理小说传播新的文学内容,通过描叙城市景观向更多读者传播关于“现代城市”的知识,发起文学现场评论,使上海文学场域显出越来越强的现代色彩。

①芮和师、范伯群等:《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50页。

②栾梅健:《稿费制度的确立与职业作家的出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2期。

③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324页。

④《月月小说》第二号,1907年1月。

⑤郑逸梅:《南社丛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8页。

⑥郑逸梅:《清末民初文坛轶事》,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85页。

文体形式、情节要素、理论争鸣这些方面的新鲜信息,都构成了上海文学场域生成时丰富的“新知识”背景。

科幻、侦探等类翻译作品受到上海市民读者的欢迎,首先缘于其中蕴含的“新知识”要素。以谴责小说著称的吴趼人,就注意到“新知识”对于小说创作的积极意义:“读小说者,其专注在寻绎趣味,而新知识实即暗寓于趣味之中,故随趣味而输入之而不觉也。”^①他把“新知识”和“趣味”相提并论,显然是出于小说家的敏感;对于“新知识实即暗寓于趣味之中”的强调,则反映出对“新知识”作为小说叙事审美支撑功能的深刻理解。“域外小说的输入,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文学结构内部的变迁,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发展的原动力。”^②这种“原动力”最初是从上海登陆,并且由迁沪作家竭力推动的。当事人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新小说》出版了,引起了知识界的兴味,哄动一时,而且,销数亦非常发达。”^③从文学生产与消费的角度来看,这些“新知识”鼓励了更多迁沪作家著译错杂的文学活动,也激生了武侠小说等新的品类,平江不肖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翻译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的风气始于沪上,《新小说》存续期间,翻译作品几乎占一半比例,从而引发了各家刊物对翻译作品的重视,小说文体形式与艺术笔法因之而丰富和更新。《绣像小说》刊登了《华生包探案》(柯南道尔),《月月小说》则将范围扩展到美、英、俄等国的侦探小说,甚至把一些西方刑事案件作为侦探小说翻译过来。《小说时报》专注于科幻小说,创刊号上的《电世界》(署名高阳不才子),从主人公名字到故事情节都可以看出前期政治小说的影响,除了介绍电的知识,主要叙述名为黄震球的“电学大王”利用电能搞发明创造,最后使中国称霸于世界的故事。包天笑的《鸭之飞行机》和《新造人术》,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飞机和医学的想象。不断更新与丰富的小说体裁使市民读者的阅读兴趣持续跟随刊物和已经形成特色的作家群。包天笑、张丹斧都是当时的畅销作家,也是各家刊物着力结交的对象。

也许是受到《海上花列传》叙事思路的暗示,晚清到民初迁沪作家的小说叙事多设置外地人进入上海游历的叙事线索,这缘于作者既有的“进入者”角色和“游历”体验,也缘于上海比其他地方具有越来越鲜明的都市特色。随着叙事展开,“游历”变成了“展示”,这其实反映出作家逐渐认同迁居地文化氛围的心理,客观上产生的效果是向更广大范围传播关于“现代城市”的知识,形成文化示范效应。从这类作品的叙事视角来看,叙述者是站在都市与外来者之间的,暗示了作者对于都市与都市之外空间的双重审视,侧面印证了作者从外地迁入城市逐渐适应城市文化思维这种“生成性”特点。李伯元曾经在小说中描写过上海与外地在新闻传播速度方面的差异:乡下的姚老夫子带几个徒弟到上海,见到报贩“《申报》、《新闻报》、《沪报》,一路喊了过来。姚老夫子便向卖报的花了十二个钱,买了一张《新闻报》。”这里的叙述重点是上海报纸种类多、报价低廉,隐含了对都市文化生活内容的评价,然后借人物声口比较上海与乡下的差异:“这就是上海当天出的新闻纸,我们在家里看的都是隔夜的,甚至过了三四天的还有。要看当天的,只上海本地一处有。”^④这种以报刊媒介为象征符号点明都市与乡村文化空间差异的技法,概因作者迁居上海的生活经验。

这些叙事还起到了影响更为深远的历史作用,即提供了观察现代都市的视角,将能够充分反映工商业文明的那些物质要素逐一展示,报刊杂志、报贩报摊之外,电器设施、大楼马路、洋人行止、西洋器物,都被作家形诸笔端,既塑造了一个越来越鲜明的“上海”形象,也为现代作家的都市叙事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并且为都市之外的读者理解现代文明打开了一个窗口。这些对于城市或宏观或微观的描

①吴趼人:《〈月月小说〉(序)》,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2—153页。

②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3页。

③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357页。

④李伯元:《文明小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92页。

写,首先反映的是迁沪作家对这些事物的惊奇观感,后来发展到叙写有轨电车、百货公司、电影院、舞厅等更为典型的都市景观,既反映了作为叙述对象的上海之变迁,也反映出进入上海的作家对都市的内涵理解越来越深入,客观上为现代都市叙事的成熟提供了必要的艺术经验,也为现代作家批判都市的各种文化景观提供了合理性,毕竟迁居上海的多数作家觉得自己生活在底层,或者对底层人的生活更感到同情。

从作家迁徙的角度看,民国成立前后从江浙地区迁沪的作家凭借文学创作和编辑活动在上海获得稳定生活之后,对现实政治失望而创作言情小说,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拥有的思想资源更具中国传统内涵,对于西方的现代民主思想都是经过报刊并不系统全面的介绍而得知,基本没有中国之外空间的生活经历,在没有获得思想资源系统更新的情况下,其思维方式和创作路子不能不趋于固化。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拥有的思想资源比他们更为系统也更加“现代化”,很多留学生在西方社会中的亲身经历也使他们获得了全新的视角。这当中显然存在深刻的世代差异和空间差异。从吴趼人、李伯元到包天笑、徐枕亚他们的类型化创作和争相创办的刊物形成了场效应,这是建构文学场域的必要条件,对于晚清至民初的上海来说,这种场效应的主要推手是迁沪作家。不同类型的作品集束推出,加快了场效应内涵的更替,却也在整体上彰显了场效应,使得大批作家融入这种场效应,在更广范围和更多领域发酵出丰富多彩的文学生态,推动上海文学生态逐渐摆脱传统气息,显现出越来越明晰的现代色彩。从政治小说、谴责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政治小说的变体,因理想不成而谴责现实)、向侦探小说、科幻小说与言情小说并举格局的演变,可以看出这种借助“新知识”牵动整体文学场域的历史生成性特点。

小说品类逐渐丰富产生了连锁效应,关于小说的理论争鸣渐多,这对于现代小说的文体发展和理论创新大有裨益,对于那些刚刚安居的作家来说,争鸣也未尝不是一种“新知识”。中国古代诗话词话丰富,而关于小说的理论相对少了很多,迁沪作家在晚清到民国初期的一个重要贡献就在小说理论争鸣方面,他们从文体结构、主题择取、叙述角度、语言技巧、人物塑造等方面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逐步颠覆了古典文学观念,提出了一套与现代都市文学消费相契合的比较系统的小说主张,这就从理论内涵层面夯实了上海早期的文学生态。1903年,狄葆贤以“楚卿”为笔名在《新小说》杂志第7期上发表《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提出“以过去、未来导人,不如以现在导人”。这不仅是在引导小说创作关注现实,也是在提醒读者注意小说反映现实生活、批评现实社会的功能。周桂笙在《毒蛇圈译者识语》中对倒叙手法的推崇,《月月小说》对短篇小说的提倡,王无生对小说期刊胜于单行本的分析,^①都是根据市民读者的接受特点而发的。相比之下,徐念慈、黄摩西在《小说林》发刊词(1907年)中提出的观点就更具理论深度和高度,“小说之实质”是“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这已经完全超越了政治小说,并且将“写情”也纳入“美”的标准予以考量,“一小说也,而号于人曰,吾不屑为美,一秉立诚明善之宗旨,则不过一无价值之讲义,不规则之格言而已。”等到1908年,徐念慈在《余之小说观》中把小说定价问题作为八大观念之一提出来的时候,已经把对于小说文体的探讨扩展到文学生产与消费的领域了。^②从《新小说》开始的定时定期出刊方式,与现代市民生活作息规律相匹配,并且形成传播惯例,进而影响到报刊连载形式对作家创作时间周期和篇幅安排的节制,都逐渐使都市媒介环境和作家创作形成长期良好的互动关系。

不过,清末民初迁沪作家偶有海外游历见闻,还没有像后来掀起新文化运动的留学生那样拥有关于外部世界的系统知识和理论思维,以“新知识”招徕读者,一方面使他们的创作停留在趣味的层面

^①天僊生:《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8—39页。

^②觉我:《余之小说观》,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7页。

上,另一方面因为对市民阅读趣味的照顾使他们肢解甚至忽略了“新知识”的深层内涵。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包天笑和杨紫麟对《迦茵小传》的翻译。他们在序言中说找到的原书残缺,所以只能译出一部分,哀感顽艳,颇吸引读者;后来林纾在《哈氏丛书》中找到全文并译出,却招致骂名,原因是林纾所译的部分有些违背了中国传统道德。包杨二人的行为“实际是出于迎合读者群的审美意识形态……强化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秩序”。^①从传播“新知识”的角度来看,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言说的内容显然更“新”,才会在短时间内“极盛一时”。这反过来说明,到1920年《小说新报》登出停刊启事的时候,迁沪作家已经建构了比较系统的上海文学生态,只是被新文化运动建构的北京文学场域超越了。

尽管江浙迁沪作家不像鲁迅周作人翻译域外小说那样把“介绍外国新文学”当作事业,将“学问”“同志”“功夫”的自我约束排在“读者”之前,^②他们仍然积极展开对小说文体特点和功能的整体思考,探索小说理论创新的路径,只不过初期仍然仿照诗话的格式,作简短比拟式的点评。形式虽然还比较粗糙,却不能不说这意味着拉开了现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序幕。起点是《新小说》第七期(1903年)开始创设的《小说丛话》专栏,从梁启超的记述可以看出,此举得到了当时往来于上海和日本的小说家的共鸣:“余今春航海时,篋中挟《桃花扇》一部,藉以消遣,偶有所触,缀笔记十余条。昨平子(狄葆贤)、蛭庵、废斋、彗庵、均历、曼殊集余所,出示之,全曰:‘是小说丛话也,亦中国前此未有之作,盍多为数十条,成一帙焉?’谈次,因相与纵论小说,各述其所心得之微言大义,无一不足解颐者。余曰:‘各笔之,便一帙。’众曰:‘善。’遂命纸笔,一夕而得百数十条,界新小说社次第刊之。”^③由于点评的都是杂志上发表的新作,这种形式既梳理了创作流向,又及时扩大了新创小说的社会影响。从上述倡议者的名单可以看出,在梁启超寓所酝酿“丛话”的基本上都是江浙迁沪作家。多家杂志迅速效仿,《小说林》创设了《小说小话》,《新小说丛》创设了《新小说品》等,《老残游记》《孽海花》都在刊出不久即得到评价。这意味着评论与创作形成了及时互动的氛围,而现场批评对于创作繁荣以及更多“新知识”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前此未有之作”的自信表述,侧面流露出创造、传播“新知识”的内在诉求。

三、迁居写作促进媒介生态繁荣

上海文学场域的生成,除了依赖比较集中的高文化水平人群作为读者,更赖于拥有创作欲望和创作能力的作家向上海的迁徙,此外还必须有一个物质条件,那就是传播媒介,众多刊物形成互相竞争、互相促进的良好媒介生态。到1910年,以“小说”之名号召的出版机构有小说林社、小说新书社、新世界小说社、新小说社、上海改良小说会社、社会小说社、新小说林社、上洋小说支卖社、古佚小说刊行会等,另外文宜书局、文海书局、大观报馆、海左书局、萃文书局等也以出版小说为主要业务。这些小说刊物和书局营造了一种不同于诗文吟诵时代的媒介生态。

考察20世纪初上海的媒介环境,要追溯到《申报》早期作者群包括韩邦庆、王韬等。尽管他们有《海上花列传》这样的章回小说、《卧游集》这样的笔记杂俎摘录,却仍然是侧重市民趣味、意在销售市场的;在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号召之前,即使上海的报刊业已经较为繁荣,小说翻译与创作也比较丰富,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态并未成为政治启蒙的工具,也没有承载多少对于西方近现代文化思想的介绍鼓动功能,尽管王韬这个“长毛状元”对西方文化已有较深理解。韩邦庆、王韬、吴趼人等可以看作第一代迁居上海的作家,以写作为生,讥弹时政,逐渐以中国之外的世界为文化参照,隐隐撬动

^① 辛红娟:《意识形态与翻译选择》,《求索》2004年第4期。

^②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5页。

^③ 梁启超:《小说丛话》,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8页。

传统文学格局,报刊杂志的强大传播功能开始显现;徐枕亚、吴双热等是第二代,虽然在情感方式和文体表现方面仍未完全摆脱传统文学的窠臼,也都已经充分注意发挥报刊杂志的传播功能,创作重心已是小说,并且努力把传统诗意输入到逐渐现代化的小说文体之中,提供了有益的艺术经验,可以称之为破茧露头而尚未化为现代的蝶。在他们的影响下,包天笑、上海本地出生的周桂笙、周瘦鹃紧承第二代,其表现形式不仅以小说为重心的,而且优游自如地运用西方技法与艺术观念,关注市民阅读趣味,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开启民智的传播效果。这些都与上海华洋杂处的文化空间对于各种政治权力的疏离有关,又与这个都市的资本属性有关。资本既与政治权力相互结合,又与政治权力形成不同形态的博弈,以文学为立身之本的作家往往不得不徘徊于二者之间,既努力争取相对独立,又往往感到压抑或屈辱,并且因这压抑感获得审美批评的精神动力和写作资源。这些都和迁居者的身份与诉求相关,互相交织。

《新小说》、《绣像小说》、《小说林》、《月月小说》被称为20世纪初上海的四大小说刊物,从主编和主要作者来看,绝大部分是江浙迁沪人士;从其行销范围来看,以上海及周边地区为主,上海成为较大区域内的文学创作和传播中心,其文化辐射体现在刊物销量的增加和范围的扩大,还体现为作家倾向于把自己的作品推介到上海,更多人迁沪办刊。虽然《申报》等老牌报纸早就成为上海市民阅读的日常内容,但是小说杂志大量创办,进而影响到报纸副刊纷纷连载小说,以至于影响到市民阅读习惯的,不能不以《新小说》的创办为标志。这个由梁启超创办于日本的杂志,其主要销售业务以上海为中心,后来编辑部迁到上海,由吴趼人等主持,杂志的影响才真正扩大。曹聚仁少年时代通过阅读报刊杂志就对十里洋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①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上海媒介已经使他产生了深刻印象。

报馆书店编辑部作为公共交往平台,折射出作家迁徙到异地之后重新以文学身份聚合的现代特征,反映了媒介与作家的共生共振关系。报馆、杂志社、书局等出版机构的争相创办,为迁沪作家聚合提供了不少类似于俱乐部的公共空间,在报馆中聚会的作家虽然不像后来北京“太太的客厅”那样专注于文艺研讨,却在这特定的空间中强化了友谊,结成比较稳定的群落关系,互通信息,对于创作发表和刊物运作,显然都有益处。南社作家孙玉声创办的《笑林报》馆,“晚间会友,则九点钟后,吴趼人、周病鸳、高太痴、李伯元、沈习之、俞达夫、刘子仪、夏兰生君等诸友,无不飘然而来。兴则酌酒赋诗,弹丝品竹,各随所好,不啻一同文俱乐部。”^②众多作品中都有报馆空间或报馆人物的情节,折射出这种媒介生态繁荣的痕迹,也折射出迁沪作家依托媒介环境稳定生存的深层心理。

报刊兴旺满足了市民日常阅读的需求,不过,连载作品最终要成为单行本进入常规销售,同时随晚清教育体制改革而兴建的各式学堂也需要或译或著的教科书,于是上海出现了大量的出版机构,或以译书局的名义专事翻译,或以书局名义兼事出版古今书籍。这些出版机构并不是散乱分布的,选址比较集中,既有利于互相观察,显示自我特色,也为作家与出版机构的联系提供了便利。出版机构相对集中,正是现代城市功能分区的体现,又反过来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品位。1906年的《上海华商名簿录》记录了64个出版机构,其中河南路20家,福州路15家,山东路11家。以福州路(又称四马路)为中心的“文化街”盛况一直延续到40年代。这种出版机构云集的空间格局,随着后来作家迁徙到桂林、昆明、重庆而在更多城市扎根,成为不同城市文化空间建构的有机部分,其源头正在上海。出版机构从业人员的水平也逐渐提升,这对于出版业务和作家创作水平都是非常重要的。商务印书馆1907年录取30多名学徒,“此后每隔五六年招考一批学徒,录取人数一批比一批多,要求的文化水平也一批比一批高,最初只要求小学程度,后来要求中学、大学毕业资格,最后提高到学有专长的留学生”。^③学

①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349页。

②海上漱石生:《报海前尘录·笑林报馆之回忆》,《新夜报》1934年6月24日。

③黄警顽:《我在商务印书馆的四十年》,《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89页。

徒文化水平的变化,其实暗示了出版业本身的水平变化,也折射出上海作家和市民读者整体文化水平的不断上升,这是上海文学生态不断丰富的条件。

迁沪作家对于刊物的支持是否努力,决定了刊物的生存境况,也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上海文学生态的基本特色,即作家往往兼有报人或杂志编辑身份,这和后来京津两地新文学生态有明显区别:京津报纸杂志编辑往往由大学教师或大学生兼任,职业稳定,因而报刊生态相对稳定;上海报人的流动性较强,导致报刊生态变化频率高,上海刊物风格多样、竞争激烈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人事流动的格局造就的。

作家与刊物结成稳定合作关系,保证了刊物的良好运作,但是这还不够,因为众多刊物因为各自生存问题产生的竞争迫使作家各显特色,促使他们不断更新自己的写作内容和文体特色,带动刊物在版块排布和内容侧重方面积极变革,客观上促进了更多文学品类的出现。《月月小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该刊原来以吴趼人的谴责小说吸引读者,与《小说林》《绣像小说》不分轩輊,于是便有周桂笙侧重译著,该刊因之形成创作与译著并重的特色;《绣像小说》随即跟进,发表了奚若(原名奚伯璩,苏州人)翻译的《天方夜谈》、吴涛从日文转译的德国小说《卖国奴》等;这种在竞争中以增加外国文学翻译彰显特色的做法,在后来各地非常普遍,都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上海媒介的经验。陈独秀到达北京大学后,《新青年》连续推出的“易卜生专号”与《小说月报》推出的“俄国文学专号”“法国文学专号”互相呼应,在作品的整体性规划和启蒙思想的深度方面自是超出上海早期杂志,不过在办刊思维上不能否认其影响。当外国文学翻译的做法被多家杂志采纳,便有了侦探小说和武侠小说的创作热潮,进一步引发了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叙事、程小青的“霍桑探案”系列。文学创作不断翻新,背后隐伏着刊物不断推新的潮汐。

迁沪作家与报刊形成的稳定合作关系,构筑了上海文学场域顺利发育的基础,进而保证了媒介生态的稳定繁荣和作家创作的稳定持续,毕竟在邮传条件尚不发达的时代,一个区域内文学生态的长期繁荣需要稳定的作家队伍,甚至吸引更多的作者迁来,才能保证稿源。每家报刊都招纳了一批作家专门提供稿件,以形成自我刊物特色,由于初期稿费较低,或作者名气不足,就出现了一个作家同时为不同报刊提供文稿的情况,或者一个作家兼任不同报刊的编辑工作,吴趼人、李伯元、徐念慈、包天笑等都曾如此。这样一来,作家与报刊就形成了多重交织关系,使得上海的刊物在竞争与合作的格局中逐步趋于整体繁荣。相对于古代文学创作与传播格局,民国建立前后的上海文学界,形成了两个具有“现代”色彩的特点:其一是以文学创作为生而且长期合作的作家多,远远多于国内其他地区;其二是为这种作家群提供发表机会的刊物多,也在国内遥遥领先,使上海对其他地区形成示范效应。^①由于现代报刊的出版频率远远高于古代,作家作为一种专门职业也就在上海开启了历史。清末民初迁沪作家的生存诉求包含了两个层面,即求职和求稳,稳定的职业能够同时满足双重诉求,所以既努力与刊物结成稳定的共同体,又可以游走在不同刊物之间,就成为他们最合理的选择。

主持编务或者创办刊物的迁沪作家还有一个重要贡献,那就是在刊物上登出西方作家的肖像或照片,使自己的刊物显得“洋”派十足,这在客观上拉开了现代文学图像叙事的历史序幕。《新小说》第一号刊登的首张照片即为“俄国大小说家托尔斯泰像”,第二卷起迁到上海,陆续刊登了舍路拉(席勒)、哥地(歌德)、斯利(雪莱)等西方文学家的照片。传统绣像小说上的图像是“画”出来的,类型化色彩明显,反而压缩了读者的想象空间;晚清至民初上海报刊上登出的西方作家照片,具有和画像完全不同的美学效果,使读者感到一种“陌生”与“惊讶”。这种明确借重异域形象的办刊形式很快被《月月小说》等袭用,《小说林》不仅登出雨果、大仲马、狄更斯、凡尔纳的照片,还配发作家小传,介绍

^①朱寿桐:《论作为现代文学中心的上海》,《学术月刊》2004年第6期。

其生平。欧洲近代作家的肖像频频刊出,固然体现出刊物的“洋”派特色,客观上也为西方文化思想输入提供了渠道。《新青年》不仅刊出雪莱、拜伦、易卜生专号,也刊登这些作家的肖像或照片,影响来源不言而喻。这些刊物还登出主编或者作者照片,起到的则是隐性广告效应。《月月小说》第一号就登出了穿长衫马褂的吴趼人、穿西装的总译述周桂笙二人的照片。当然,像《小说时报》那样刊登妓女照片,属于“色相示人”,虽然有违文学之雅,却能应和部分市民的趣味,就像“花榜”增加了小报的销量一样,反映出城市文化的芜杂特征。这些文学周边的附属物,“为文本提供了一种(变化的)氛围,有时甚至提供了一种官方或半官方的评论”。^①

晚清上海报刊繁荣,除了留下几部谴责小说作为时代精品,更多作品在一轮又一轮阅读热潮之后被读者遗忘,其实折射出一个深层问题:大众文化消费期待相应环境中稳定的创作成品,双方互动形成稳定的文学生态;当不再有新鲜作家队伍迁入,已有文学生态将显出停滞态势。江浙作家向上海的迁徙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基本中止,新的迁徙方向是北京,新的文学风范也兴起于北京。《小说新报》的《停刊启事》暗示了上海文学生态的停滞。

综上所述,清末民初江浙作家向上海的迁徙与文学活动,在作者队伍的聚合与呼应、新技法的引进与融合、借助“新知识”推动文学生产、创作与发表传播繁荣媒介生态等方面,完成了上海文学场域具有现代品格的系统建构。

(责任编辑:程天君 石亚兵)

The Migration of Write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Formation of Literary Field in Shanghai

WANG Li

Abstract: With the migration of writers from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 to Shanghai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more and more writers' communities came into being in this newly-built city, which provided new opportunities for modern writers to survive and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This migration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he production of theoretical literary knowledge and provided rich resources for the prosperity of modern literary media. The positive activities of these writers in Shanghai involving personnel aggregation, media prosperity,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and theoretical production made the city the earliest mature field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Key words: migration; literary field in Shanghai; formation

About the author: WANG Li, PhD in literature, is Professor and MA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① [法]热拉尔·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选 批评译文选》,史忠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8页。